

新媒体在社会运动集体认同建构中的作用初探

——以“启东事件”为例*

周洋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本文以“启东事件”为例,将事件划分为环境运动和民权运动两个阶段,采用戈夫曼的“框架理论”,通过对两个阶段中新媒体平台中新闻报道和网民意见的分析,再现该事件中集体认同形成的过程,探讨新媒体在集体认同形成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本研究认为,新媒体在社会运动集体认同形成过程中主要起到范畴化、唤醒并生产集体记忆、生产和再生产意识形态和提供不同类型话语间充分竞争的可能性的作用,这些作用在认同形成的“聚合”“融合”和“磨合”的三个环节中都有体现。而新媒体的作用均是依附于既有的现实展开的,对这一问题更为深入的讨论应该对阶级、个人利益、文化等因素进行进一步的检视。

关键词:集体认同;新媒体;环境运动;转型;民权运动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5)03-0089-07

如果前互联网时代,地理空间的限制、沟通方式的有限性和共同话语体系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①的发生和发展,那么互联网作为一种沟通技术的共和性则为打破地理空间、建构共同的话语体系提供了可能性。近年来,在中国,无论是自发性很强的小范围集体行动,还是组织程度较高、涉及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更广的较大型社会运动都时有发生,社会各阶级之间进一步“断裂”^[1]。互联网,尤其是网络新媒体在这一过程中功不可没。

一方面,社会转型中各种矛盾短期内无法改变,想减少这些事件的负面影响,研究新媒体在社会运动过程中的作用十分必要。另一方面,认同的

建构在社会运动中至关重要,要研究新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首先就要研究新媒体在社会运动过程中集体认同建构的作用。当然,这也有助于厘清新媒体在当下中国民主政治实现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认同、新媒体与社会运动

通常对认同的定义包括文化视角和集体视角^[2]。本研究从集体视角出发,强调认同的微观层面,认为认同是互动性建构的产物,社会运动正是通过这一机制开展和维持。查尔斯·泰勒认为,集体认同是由一个拥有共同利益、共同经验和团结所作的定义,通过互动而建构、激活和维持“我们”共同的感觉^[3]。即集体认同是人们对集体成员、团体

* [收稿日期]2014-12-10

[作者简介]周洋(1991—),男,江苏沐阳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传播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新媒体与社会研究。

① 本文采用的是赵鼎新在《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一书中区分的社会运动、新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的概念。他认为,集体行动就是由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制度外的政治行为;社会运动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的政治行为;而新社会运动相对于传统社会运动来说则具有运动目的的非物质性、凝聚基础的认同化、以公民社会本身为运动目标和参与人群的非等级化等特性。

边界和集体活动所达成的一致性的定义。由此引申集体认同形成的过程:将自己与其他群体隔离和区分开来的边界的形成、用来判断团体地位标准的意识的发展、通过日常生活的政治化方式稳定某个团体的本质性差异^[4]。

对于新媒体与社会运动的集体认同两者关系的研究,其思路最早可以追溯到伊尼斯的研究,他认为任何技术都带有一定的偏向,即“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5];紧随其后的麦克卢汉、尼尔·波兹曼等在内的媒介环境学派的成员^[6]都从这一观点出发,探讨媒介与社会的互动。社会运动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实践活动,其与媒介的关系也可从中窥见。

对两者之间关系更为直接的研究也有很多,曼纽尔·卡斯特认为新媒体生产出了新的以信息系统为边界的虚拟社区,人们在这个社区中共享信息、分享情感,形成对社会运动的认同感,新媒体起到了提供边界的作用^[7]。Laura Stein 通过对社会运动网站的使用和社会运动集体认同的关系的研究指出,利用好“社会运动专页”的社会运动组织者或发起人能够更快捷有效并且更持久地吸引人们的共识,社会运动的效果也更明显^[8]。Melissa Wall 以针对全球化的抗议活动为对象的研究则表明,电子邮件在社会运动组织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不同邮件内容和诉求重点对社会运动的走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9]。

这些研究多从社会建构论出发,或从理论层面直接发展结论,或从特定媒介出发研究其对社会运动集体认同中的作用,而从中观层面针对具体特定的事件进行分析的研究几乎没有。本文试图在这一方面做出努力,丰富相关知识,同时也为理解社会运动中集体认同的建构提供一个模型。

二、“环境运动”+“民权运动”

“启东事件”萌芽自2002年南通市政府“达标污水排海工程”的项目建设的提出^[10];2004年,排污入海口定在了启东蒿枝港和塘芦港之间,引发了民众对污染的担忧;六次官方研讨会后,2007年,工程进入实质运营阶段,旨在征求公众对该工程的意见的调查公示在南通市环保局官方网站上贴出;2009年2月,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获批;2011年南

通市开发区管委会发布的工程情况汇报显示,项目总投资约12.5亿元^[11]。

与此同时,市政府内部也流行着“谁也不愿意自己的厨房被别人当作厕所”^[12]的说法;2006年,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致信温家宝称因易致污染,王子制纸项目需慎重考虑;2007年项目进入实质操作阶段后,专家报告中的经费和规模不断被调整;2010年10月,环保人士“私自闯入”王子制纸厂后,政府中有人开始意识到之前的座谈会似乎很不成功。但是市政府方面执意推进,先后成立了项目办公室、“王子办”等机构,在这些机构的文件中,“确保、力求通过”等字样大量出现。

2012年7月26日,南通市政府网站贴出了一段名为《致全体市民的一封信》的视频,称排海工程正在进一步论证评估,与之前的说法并不一致。7月28日早7点左右,市政府大楼被市民占领。他们沿街散发《告全市人民书》,冲进市政府大楼并从中搜出保险套、名贵烟酒、红包及许多旅游照片,并在警察到来之前将这些物证陈列在政府办公楼前,市长甚至被扒光衣服。事件一发生便震惊全国,最终以政府永久叫停该项目^[13],对占领政府大楼的百姓“不再追究”告终。

但此次事件现场的环境诉求似乎已经被淹没,出于种种原因,抗议者行为的诉求和指向已经远远超出了阻止项目上马本身,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不满的宣泄在后来的行动中超越前者,成为主要诉求。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将事件分为两个阶段分别进行:环境运动阶段和民权运动阶段。前者主要指事件酝酿的过程,而后者则主要指抗争手段较为激烈的突发过程。

当下中国与此相类的社会运动,从启蒙、发展直至矛盾集中爆发,都经历了协商空间从有到无的过程。官民矛盾在这一过程中从温和走向尖锐,抗议方式也由温和走向激烈,最终矛头都会指向政府。民众利用这种抗争向政府争取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和利益,社会运动几乎无一例外地转型成为民权运动,“启东事件”在此意义上具有代表性。

三、“启东事件”中新媒体参与认同建构过程的再现

本研究主要依托尔文·戈夫曼的框架分析的

方法进行文本分析,对认同过程进行再现,定量描述并定性分析事件每一阶段的认同建构过程。

在戈夫曼的论述中,所谓框架是沿着舒茨的现象学思路阐发的、关注人们在生活中如何建构社会现实这一问题的理论工具^[14]。相应地,框架分析则是试图厘清人们如何组织经验、赋予其意义,以及这一过程对人们的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的方法论。

在使用这一方法讨论新媒体对社会运动集体认同建构的作用时,本研究主要涉及到的框架有两大类:媒体框架和受众框架。这两个框架并不能截然分开,媒体包括传统媒体和网络新媒体,网络新媒体因其对传统媒体内容和受众生产的内容具有同样的包容性而显得更为复杂,事实上在两者之间也起到沟通桥梁和为两者的互动提供平台的作用。

框架分析方法的使用还涉及框架作为自变量还是因变量^[15],即谁影响谁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本研究考查的是新媒体在集体认同建构中的作用,这一问题的逻辑在于媒体框架对受众框架的影响。依据前面的分析,这一过程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了新媒体平台上。由此,本研究删繁就简,以新媒体平台上传统媒体内容、新媒体内容和受众生产的内容为分析对象展开分析。

(一) 环境运动阶段集体认同的建构

所谓环境运动指的是旨在反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行为的社会运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国家兴起。阿兰·图海纳曾提出社会运动分类的三个重要标准:运动的认同、运动的敌人和运动的图景/社会模式^[16]。卡斯特据此将环境运动分为5个大类,主要认同类型分别为“大自然的爱护者”“保卫自己空间的地方共同体”“反文化生态主义的绿色自我”“拯救地球的国际生态卫士”和“倡导绿色政治的相关公民”^[17]。这里的“倡导绿色政治的相关公民”指的是国家层面的宏观政治架构,主要关切在于国家政策对环境的关注和环境相关政策的制定。

在抽取这一阶段南通当地受关注度较高的论

坛中各种帖子和少量微博共150条,逐一按照戈夫曼的框架分析法进行分析归类后,笔者得出表1。

根据表格,对照卡斯特提出的环境运动的五种认同类型和新媒体中关于该事件的报道,笔者归纳出“启东事件”在环境运动阶段的三种主要认同类型:“保卫自己空间的地方共同体”“大自然的爱护者”和“错误决策的受害者”。

表1 “启东事件”环境运动阶段的新媒体内容的框架分析^①

框架	条数	百分比	框架含义
“政府贪腐”	35	23.3%	主要指那些认为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从这个工程中获取个人利益,并以此为依据反对工程建设的言论
“政府违逆民意”	8	5.3%	主要指那些认为政府没有做到信息公开透明,没征求老百姓意见,并以此为依据反对工程建设的言论
“害人工程”	107	71.4%	主要指那些认为这一工程对环境、对他们自身以及他们后代有害处,并以此为依据反对工程建设的言论

1. 保卫自己空间的地方共同体

在扬子晚报网2009年对江苏省发改委批复该工程建设的报道中,“南通”和“启东”作为事件的发生地多次被提及,但是这篇报道并没有刻意强调地域的概念,也没有提及环境污染问题。而在随后的报道中,对环境问题关注的声量远远超出其他。2011年《经济观察报》一篇针对该工程预算的调查性报道首先提出并分析了该工程可能导致的环境问题,当中引用了许多专家的观点,报道总体对该工程的建设提出了质疑,并对南通这个“江海明珠”

① 数据来源:该表格数据系笔者随机抽取南通当地受关注度较高的论坛中各种帖子和少量微博共150条进行框架分析的结果,主要论坛包括南通社区网、南通论坛、百度贴吧·南通吧、百度贴吧·启东吧以及其他影响较大的论坛等,微博则以新浪微博为主。由于时间跨度过大,2006年之前的一些材料已经无法搜集,能找到的都是零碎的情绪化表达,故这一阶段数据采集的时间范围为2006年至2012年7月前。

“扬子第一窗口”表达了深切的忧虑。报道一出,网络媒体纷纷转载。在各大论坛,尤其是南通当地的论坛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南通论坛、南通社区网等当地主流论坛中,这篇报道都曾被全文转载并置顶,网民参与回复的数量也有几千条之多。政府决策可能导致的污染和“江海明珠”“扬子第一窗口”的称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符号性的称谓唤起了市民对南通的担心和忧虑,南通作为一个利益主体由此被突出。

除了当下的环境外,在有“中国长寿之乡”美誉的南通,人们的另外一个诉求点是该工程建设对子孙后代的影响。2012年初南通社区网有网友发帖表达了自己在这方面的忧虑之后,得到了近百名网友的支持。随后这一观点流行开来,在南通论坛等其他当地论坛,甚至是《南通日报》上,都出现了相似观点的报道。

以上两个诉求点构成了环境运动阶段网民反对工程实施的主要依据,“南通”,无论是在媒介的报道中,还是在网友的评论和发帖中,都已经成为一个象征性的符号。当南通的利益遭到破坏时,网友们便被唤醒,发起抗议。

2. 大自然的爱护者

同样是在《经济观察报》的报道中,作者沿用了此类报道通常的写作思路,将保护环境定义为“正确、符合时代潮流的行为”,将环保主义者定义为“现代公民”;而《南都周刊》在后来的一篇报道中则将环保问题定义为“经济发展首先要考虑到的问题”“有利于子孙后代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这些报道一方面通过对项目建设可能带来的问题进行详细解释,对其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评估,引用专家的科学话语并加以日常化,引证相关法律法规质疑该工程建设的真实性以及引用社会科学相关理论探讨公民享有生活在良好环境中的权力等“进步”的话语,暗示读者环保是现代文明对每个人的要求,而现代文明是积极的,是每一个现代的人都应该毫不怀疑地追求的;另一方面通过对其他国家相同问题的处理方式及其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的深度剖析,厘清经济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环保三者的关系,并展现给读者。这种“两面理”的叙事策略对促进共识的产生和持续有着积极作用。

3. 错误决策的受害者

对于43条认为问题在于政府的帖子和微博,曼纽尔·卡斯特并没有给出足够的理论支持。事实上,把“政府贪腐”和“政府违逆民意”两个框架的含义与中国实情做一个对照,不难理解这两个框架产生的原因。

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来自各方面的反对意见似乎并没有动摇政府进行工程建设的决心,用一些网民的话来讲“政府肯定收了王子造纸厂很多钱”,能够不顾民意执意推行如此浩大的工程只有在“强政府,弱社会”的语境下才会成为可能。而曼纽尔·卡斯特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他书中所有的例证恰恰来自“弱政府,强社会”的语境,没有考虑过这种情况也是现实情况所决定的。但在本研究中,这一认同类型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是“政府贪腐”框架,还是“政府违逆民意”框架,整个事件的归因都指向政府。在这两个框架下,典型的言论有“为了点钱还顾老百姓死活啊?迟早有一天被抓”“开什么座谈会,根本就是走过场,完了我们老百姓还是什么都不懂”等等,网民事实上是把自己摆在了一个“错误决策的受害者”的位置上。

在对媒体报道的分析中,这一点也得到了很好的印证。2012年7月29日,经历了28日矛盾的集中爆发,“启东事件”才开始真正意义上有全国影响力。在2012年8月《南都周刊》对该事件的报道中,“攻击者还是受害者”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该报道经新浪微博发布后,转发过十万,被“赞”近万次,大多数网民都觉得这个问题很关键,也问到了他们的心坎上。

(二)“启东事件”的民权运动转型及其认同的建构

如果说在2010年10月环保人士“私自闯入”王子制纸厂时,“启东事件”还可以算是环境运动的话,那么当几次座谈会后启东人民的声音都没有体现在政府决策中,当“确保通过”“务必开始”等字眼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媒体对政府推动该工程建设的报道中时,“启东事件”已经悄然开始向民权运动转型了。

民权运动即维护公民权力的运动,其目标指向很明确,就是损害公民权力的人或机构^[18]。笔者在前文分析的环境运动阶段的三种认同类型中也曾提及“错误决策的受害者”一说,但是前一阶段中,“保卫自己空间的地方共同体”“大自然的爱护者”

仍然是占据主流的集体认同类型。而且到了第二阶段,虽然认同类型同为“错误决策的受害者”,但是抗议的对象已经由“污染源”“无拘无束地开发”转向了以政府及其决策人员为主体。至此,“启东事件”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环境运动了,转型已经悄然发生。

转型后的微博和论坛言论的分析结果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趋势,如下表2所示。事件集中爆发之前的26日,启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建新在市政府官方网站贴出的名为《致全体市民的一封信》视频中,他延续启东市政府一贯的口径,突出强调排海工程可能带来的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增长,同时淡化工程可能造成的污染。

表2 “启东事件”环境运动阶段的新媒体内容的框架分析^①

框架	条数	百分比	框架含义
归因政府 框架	40	26.7%	主要指那些认为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从这个工程中获取个人利益,或是政府没做到公开透明导致错误决策,并以此为依据反对工程建设的言论
决策受害者 框架	71	47.3%	主要指那些觉得自己是建此工程的直接受害者,认为政府不应该做出这样的决策或抱怨政府的行事作风一直如此,应该有所改变的言论
害人工程	16	10.7%	主要指那些认为这一工程对环境、对他们自身以及他们后代有害处,并以此为依据反对工程建设的言论
其他	23	15.3%	主要包括将此次运动中个别的媒体兴奋点作为中心进行评论的言论

这时,又有好事者翻出了年初网友对子孙后代所表达的忧虑和《经济观察报》的分析文章,并在南通社区网和南通论坛等网络新媒体空间重复发帖,以引起大家的注意。迈克尔·豪格在《社会认同过程》一书中分析社会认同和集体运动的关系时指出,“当某一议题对于个体来说是重要的、显著的、密切相关的、关乎个人价值的时候,增强效应(群聚)会明显增加”^[19]。相比副市长空泛的“演讲”,网友的发帖无论在行为主体的社会距离上,还是在传播内容的接近性上,都对民众更重要,更显著,更密切相关,更关乎他们的个人价值。加上环境运动阶段人们对这一问题已经有所认识,市长的讲话反而促进了民众“错误决策的受害者”这一共识的达成,也因此,在笔者随机抽取的150个分析样本中,有多达111份是对政府的抱怨和反对。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反对的声音中,还有许多声音与“启东事件”游民星空本身并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跳出具体的事件,矛头直指政府的一贯作风。而对政府的批评,尤其是对政府作风的批评,一直是中国媒体热议的一个话题。而且,此次事件无论就其影响力,还是事情本身的当事双方、事件的性质,都足以成为支撑政府负面形象的证据,故事件一经曝光,这个一贯的报道思路不可避免地被媒体采用。

贝尔特·克兰德尔曼斯在《抗议的社会建构和多组织场域》一文的研究中指出,“在公共话语中,论点是在对反论点、新的信息和新的事件做出回应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媒介话语已经成为这一渐进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20],民权运动阶段的认同建构实际上是基于环境运动阶段的,两者并不能截然分开。

回顾整个认同建构过程,无论是以官方的种种文书和官方媒体及其新媒体平台为代表的官方舆论场,还是以《经济观察报》《南都周刊》以及南通社区网和新浪微博网友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场,都对集体认同的建构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两者在以新媒体为平台的对立互动中不断补充新的信息,并

^① 数据来源:该表格数据系笔者随机抽取南通当地受关注度较高的论坛中各种帖子和微博共150条进行框架分析的结果,主要论坛包括南通社区网、南通论坛、百度贴吧·南通吧、百度贴吧·启东吧以及其他影响较大的论坛等,微博部分则主要从新浪微博抽取;依据本研究对“启东事件”的分阶段,这一阶段数据采集的时间范围为2012年7月至2012年9月之间。

在对以往事件的回顾中不断强化“排海工程是害人工程”“政府问题很大”的观点,网民“保卫自己空间的地方共同体”“大自然的爱护者”和“错误决策的受害者”三种认同类型也先后被强化。这在赋予参与运动网民一种“抗议是正义的”的符号资本的同时也赋予了抗议运动的合法性,抗议活动由此得到开展。

四、新媒体在社会运动集体认同建构过程中的作用

至此,本研究已经分两个阶段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出发对“启东事件”的认同建构过程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新媒体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已经可以初步窥见。以前述“三步走”的认同形成过程为分析框架,本研究认为:新媒体在社会运动认同建构过程中主要起到范畴化、唤醒并生产集体记忆、生产和再生产意识形态和提供不同类型话语间充分竞争的可能性的作用。

(一) 范畴化

范畴化即认同群体的聚集^[21]。社会认同路径主张,社会是由社会范畴组成的,这些范畴在权力和地位上彼此相关。“启东事件”认同形成的过程中,新媒体发挥范畴化作用主要有三层意涵。

首先是新媒体天然的范畴化属性,认同形成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有人关注它,并且关注它的人能够聚集到一起,“启东事件”中扬子晚报网等媒体最初的报道即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其次是聚集与议题相关的人,最后是聚集与议题无直接关联的人。环境运动阶段,新媒体聚集的人群主要包括渔民和与事件直接相关的南通市民,这一阶段中新媒体中的发声者主要来自江苏省内媒体、南通当地的论坛,诉求框架也主要集中在“政府贪腐”“政府违逆民意”和“害人工程”,这与上述两类人群相呼应;而民权运动阶段,诉求框架多了15.3%的“其他”,即“将此次运动中个别的媒体兴奋点作为中心进行评论的言论”,这其中就包含与事件并非直接相关的人,他们通过新媒体被聚集,从自己的视角声援这场运动,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良好的舆论和社会基础。

(二) 唤醒并生产集体记忆

唤醒并生产集体记忆的作用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相较于传统媒体的新闻形态,新媒体的新闻报道更具有整合性和全面性,通过链接、专题等各种内容形式和技术手段,新媒体将相互联系的各种因素综合呈现在受众面前,这些相互联系的因素与受众既有的认知结构相重合,由此唤醒与运动相关的集体记忆。“启东事件”中,新媒体对“长寿之乡”“江海明珠”的提及和使用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其次,新媒体还会参与集体记忆^[22]的生产过程。历时地看,“启东事件”两个阶段的诉求框架具有一定的继承性,新出现的“其他”框架事实上也是先前报道的素材的整合和内化与长期以来的社会基调相结合的产物。在此次事件认同形成的过程中,先前关于政府不公的集体记忆在新媒体的动员下被整合到了当下运动的话语体系中,达到了凝聚与事件不直接相关的人群的作用。

(三) 生产和再生产意识形态

新媒体生产和再生产意识形态的作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前两者综合的产物。如果将这一过程简化为具体事物生产的过程,那么可以看到,这一过程中的“原料”是既有的集体记忆和新媒体报道的事实,加工的容器是由新媒体聚集而来的人,而制作工序则由新媒体本身完成。

事实上,在本文第四部分描述的整个过程都是新媒体在不断生产和再生产意识形态的过程,主要方法包括重复、寻找联系、赋予特定观点的正当性、借由已具正当性的观点使人产生对特定观点的同情等。这从“启东事件”开始之后,“南通”“抵制污染是文明的”“长寿之乡”“江海明珠”等符号先后成为抵抗的资本,获得运动参与者的同情,从而在最后成为为整个运动服务的意识形态中可见一斑。

此外,“反集体记忆”,或者说“反观点”^[23],也是意识形态生产的一个重要原材料。这些材料在新媒体的加工过程中并不如“正集体记忆”或“正观念”一样那么顺利,而是通过相应的报道角度、报道惯性和特定的利益关系和政治经济学的考量,生产出的一个综合的、关于这一观念的、有利于推动运动发展的意识形态。“启东事件”中,对政府又恨又

依赖的反意识形态经过各方力量的角力,最终成为运动的推动性意识形态之一,这有违中国环境运动“一直在争取政府同情”的共识,因而从这一角度重新思考这一共识也显得尤为必要。

(四) 提供不同类型话语充分竞争的可能性

前述的三个功能都为整个运动提供了来自各方的话语,这些话语如果想占据上风进而主导运动的发生发展,就一定要在一定的场域内与其他话语进行竞争。

之所以说新媒体提供了这种可能性,首先在于技术。如果没有新媒体技术带来的交互性,很难想象仅仅依靠“启东事件”的参与者们及时与政府产生互动,就能迫使政府多次修改提案。最终运动发生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基于新媒体这种交互性的斗争民意的一边倒,政府成为弱势,社会运动成为可能。

其次,“启东事件”发展过程中,曾经一度官方话语占据媒体话语的主流,传统媒体对政府言听计从,政府说什么就报道什么,不敢也不能提出任何异议。但是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都会对政府帮助企业建立管道将污水直接派入大海中这一计划抱有质疑。而当《经济观察报》捅破这层窗户纸,通过新媒体迅速而广泛的扩散,加上新媒体本身的匿名性,民间话语出现井喷,事实不断被厘清。没有了复杂关系网络的束缚和对利益的担忧,人们的表达也更加真实可信,新媒体由此成为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竞争的平台,不同类型话语的竞争成为可能。

五、结语

值得注意的是,新媒体在认同建构的过程中虽然有着诸多的功能,扮演着诸多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仅有新媒体就能够促成认同的建构,乃至运动的发生,而框架分析的结果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整体的情况,并不能以偏概全。当代中国的媒介体制下,新媒体的作用至多只是在认同建构的过程中的黏合剂和催化剂。谁是参与建构的人,建构出的认同是如何的,又将如何作用于社会运动,这些问题远远不是单独做新媒体的内容分析所能解决的,继续追溯的话还需要借助政治学与社会学的论述进行思考。

[参考文献]

- [1] 孙立平. 断裂: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2] 迈克尔·豪格, 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 社会认同过程[M]. 高明华,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 [3] 查尔斯·泰勒. 现代认同: 在自我中寻找人的本性[J]. 陶庆, 译. 求是学刊, 2005(5).
- [4] 迈克尔·豪格, 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 社会认同过程[M]. 高明华,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 [5] 哈罗德·伊尼斯. 帝国与传播[M]. 何道宽,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 [6] 林文刚. 媒介环境学: 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M]. 何道宽,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7] 曼纽尔·卡斯特. 认同的力量[M]. 曹荣湘, 译. 北京: 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8] Laura Stein. Social Movement Web Us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A Content Analysis of US Movement Websites [J]. New Media & Society Vol. 11. 2009(8).
- [9] Melissa A. Wall. Social Movements and Email: Expressions of Online Identity in the Globalization Protests [J]. New Media & Society. Vol. 9. 2007(4).
- [10] 《财经》编辑部. 启东启示[J]. 财经, 2012(8).
- [11] 孙炯, 周至美, 周卫, 等. 启东抗污[J]. 南都周刊, 2012(8).
- [12] 《财经》编辑部. 启东启示[J]. 财经, 2012(8).
- [13] 维基百科. 维基百科“2012年启东市反对排污项目事件”词条[EB/OL].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5%9F%E6%9D%B1%E4%BA%8B%E4%BB%B6>.
- [14] 尔文·戈夫曼. 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M]. 冯象,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15] Scheufele, Dietram A. Framing as a Theory of Media Effects [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99(1): 103-122.
- [16] 阿兰·图海纳. 行动社会学: 论工业社会[M]. 卞小平, 狄玉明,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139-160.
- [17] 曼纽尔·卡斯特. 认同的力量[M]. 曹荣湘, 译. 北京: 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70-85.
- [18] 谢岳. 抗议政治学[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0.
- [19] 迈克尔·豪格, 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 社会认同过程[M]. 高明华,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 [20] 艾尔东·莫里斯, 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 社会运

- 动理论的前沿领域[M]. 刘能,译. 秦明瑞校.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21] 迈克尔·豪格,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 社会认同过程[M]. 高明华,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 [22] 莫里斯·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M]. 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23] 高王凌. 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M].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
- (责任编辑:朱德东)

A Look at the Role of New Media in the Collective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Social Movements: Taking Qidong Event as Example

ZHOU Ya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is designed to exam what role new media exactly plays in the process of collective identity construction. Qidong Event is selected as the case and is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environmental movement and civil rights movement. With frame analysis by Goffman, this paper represents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collective identity by the analysis of news report and netizen opinion on new media in the two periods. Four main roles new media plays in this process are identified through this study: categorizing, waking-up, producing collective memory, producing and reproducing ideology and promoting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different discourses. These roles present in aggregation, integration and stabilization periods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It is highly suggested that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is issue be diverted to class, personal interests, cultural factors etc.

Key words: collective identity; new media; environmental movement; transformation; civil rights movement